

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①

杨 铭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梳理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斯坦因藏品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情况，讨论了这些写本的编号、数量、主要内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关键词：法藏 英藏 敦煌西域 古藏文文献 吐蕃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6）03—0121—11

DOI: 10.16363/j.cnki.xyyj.2016.03.016

自从上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几乎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洗劫一空，运到欧洲以后，每一个想要接触或研究这些物品的人，均要首先了解欧洲尤其是英、法两国收藏这些文物的数量和研究状况，而其中本文涉及到的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荣新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个初步的统计，他认为散落在海外的敦煌藏文写本总数应在6000件以上，主要收藏于法国、英国，其中英国收藏品目录中登记3500件。^②日本学者武内绍人（T. Takeuchi）在1997年出版的《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一书绪论中说，斯坦因前三次考察带回来的藏文文献没有完整的目录，不过就数量上而言，第二次考察所得是迄今最多的。其中，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藏文文献中，第二次考察所获的写本（IOL Tib J）共有3094件编号，第三次所获的写本（IOL Tib M）有1037件编号，简牍（IOL Tib N）数量共2457件。也就是说，据武内绍人的统计，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出于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写本共计4131个编号。^③

杨富学近期也有一个不完全的估算，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以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1370件）和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3375件）所藏最为集中。国内所藏主要集中于甘肃地区，有编号者为6656件，其中以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居多，达6050件。国内其他地区也有敦煌藏文写本入藏，数量不多，约有三百多件，其中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二百余件。再加上其他流散品，海内外的敦煌古藏文写卷的数量应在12000件左右。^④

笔者查阅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网站，披露其馆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共3014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藏文世俗法规古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110）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受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2016—XWD—B0304）资助。

② 荣新江《英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纪略》，《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③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 The British Library*, 1997-1998.

④ 赵天英，杨富学《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个编号,出自和田麻札塔格、若羌米兰的古藏文写本编有1306个编号。

上述古藏文写本和简牍,经过国内外敦煌学、藏学界几代学者近百年的整理、刊布和研究,已经出版了大批成果,无疑是敦煌学、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为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上述藏品的研究,笔者拟针对上述写本中的非佛教文献部分,即包括社会文书、历史文献、语言文学以及占卜、医药等内容在内的写本,介绍它们的入藏单位、卷数、编目、刊布和研究成果等诸多方面,供研究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地的同仁参考、引用。

一、非佛教文献的编号与刊布

斯坦因在1900~1915年间所进行的三次中亚考察,获取了大量的各种文字的写本或木简。其中数量最大的汉文写本,按照资助其考察的事先协议交给了英国博物馆,而包括古藏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文种的写本和简牍,则交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简称I. O.,位于伦敦)收藏。后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并入英国国家图书馆,这批古藏文写本入藏于后者的东方文献部(Oriental Collections of the British Library,简称O. C.),合并为“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收集品”(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简称OIOC)。上述写本中的非佛教文书由1903~1927年任馆长的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1956)负责整理;藏文佛典则交由瓦雷·普散(Valle. Poussin)编目,迟至1962年出版《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书,共收佛教经卷765个号。^①1927~1933年,托马斯陆续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上发表整理研究敦煌西域出土古藏文文书的成果。1935、1951年,他又先后以《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为名,集结出版了两卷专著:第一卷主要是从藏文《大藏经》中辑录并翻译的有关于阗的史料,其中《于阗国阿罗汉授记》参考了两件敦煌藏文写本,附录是伯希和所获敦煌藏文写本P. T. 960《于阗国教法史》的译注;第二卷刊布了39件敦煌古藏文文书,45件出自麻札塔格(其中Khad地方1件)、37件出自米兰的古藏文文书,共计121件。^②

此外,托马斯还编写了《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藏文文书目录草稿》(*Stein Tibetan Third Expedition, MSS, Eur. E. 281.*),该手稿现藏于该馆,没有正式出版。^③在上述一、二卷的基础上,托马斯和他的学生,又于1955、1963年汇集出版了该书第三、四卷。其中,第三卷是对第一、二卷某些未及展开的问题补充说明,而第四卷是具有藏英词典性质的工具书,收有完备的藏英梵词汇索引。

1977~1988年,日本“东洋文库”在山口瑞凤(Z. Yamaguchi)的主持下,在瓦雷·普散目录的基础上编成《斯坦因搜集的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共12册,以及索引1册。其中1~8分册将瓦雷·普散的765个号重新编目,自第9册开始,从1001号新编顺序号,至12册止共著录到1518号。^④

① L. de la. Vallee Poussin, *A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51.

③ 荣新江《英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纪略》,《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④ *A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1977-1988.*

1978~1979年, 斯巴尼安(A. Spanien)与今枝由郎(Y. Imaeda)合作, 编辑出版了《法藏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2册, 刊布了数件与法藏敦煌古藏文写本有关的英藏文献, 如: India Office 737《罗摩衍那》, India Office 750、British Museum Or. 8212(187)《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India Office 751《岱噶玉园寺愿文》, India Office Ch. xvii. 2《苏孜事迹残卷》, India Office Ch. xv, fragment. 12《阿骨萨部落护持射手名籍》等。^①

1984年, 陈庆英于《敦煌学辑刊》试刊第2期上发表《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一文, 检索出《斯坦因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十余条,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S. 1000(ⅴ)《藏汉对照词语残卷》、S. 2736(ⅴ)《藏汉对照词语残卷》、S. 4243(ⅴ)《汉文念珠歌藏文音译》、S. 6878(ⅴ)《占卜图》等。^②

武内绍人1995年出版的《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共转写、译注包括伯希和收藏品在内的古藏文契约58件, 其中英藏部分28件。该书收录敦煌写本12件, 比托马斯第二卷多出5件; 新疆部分16件, 均已为托马斯著录。^③

1997~1998年出版的《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一书, 由武内绍人牵头编撰, 共收出自麻札塔格、米兰、安得悦等地的古藏文写本702件, 其中麻札塔格的360件, 米兰、安得悦等地的342件。^④据此书介绍, 这些写本早先的入藏情况是: 584件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117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部, 1件藏于英国博物馆。武内绍人刊布的以麻札塔格为主的360件写本分三种情况: 第一是包括托马斯已编目、转写和译注的45件; 第二, 70件是托马斯未涉及而比较有价值的, 多为社会文书如借契、买卖契约等; 第三是占总数约三分之二的残卷, 多为古藏文片言只语。武内绍人刊布的342件米兰、安得悦等地的藏文写本, 据笔者目前所作的初步统计, 有37件是托马斯公布过的, 其余近百件具有编目、译注的价值, 剩余约两百件属于佛经或残片。

2005年, 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网站刊布了由范谢克(Sam van Schaik)等人编撰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敦煌藏文密宗文献提要》, 因其主要涉及佛教的内容, 在此不赘述。^⑤

2007年, “国际敦煌学项目”网站刊布了早年由托马斯编撰而未及出版的《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写本》, 其中佛经残片居多, 故本文未及检索。^⑥

从2010年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学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 完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之后, 开始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 将藏于该馆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全部影印出版。^⑦内容主要涉及一些重要的佛教写经, 估计有关的社会文书部分将在后面几辑中出现。

① A. Spanien, Y.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Tome I, Paris, 1978; Tome II, Paris, 1979.

② 陈庆英《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 《敦煌学辑刊》试刊第2期。

③ T.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Tokyo, 1995.

④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 The British Library, 1997, 1998.

⑤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http://idp.bl.uk/>: IDP, 2005.

⑥ <http://idp.bl.uk/>: IDP, 2007.

⑦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2012年。

2012年,由日本学者岩尾一史(K. Iwao)等人编著的《斯坦因收集品 Or. 8210 中的古藏文文献》一书出版。^① 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得的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文物编为 Or. 8210 ~ 8212 这三个总号,其中 Or. 8210 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斯坦因收集品 Or. 8210 中的古藏文文献》一书,即是将 Or. 8210 汉文写本中夹杂藏文文献的卷号单独整理成册出版,以拉丁字母转写方式收录了 88 个卷号的敦煌藏文文献。每件藏文文献著录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介绍该文献的主要内容,二是著录文献本身的保存状况,三是标注该文献影印件的出版及相关研究情况,四是该文献的拉丁字母转写。此 88 个卷号的古藏文文献分世俗文书和宗教文书两大类,涉及吐蕃历史、宗教(包括佛教和苯教)、社会经济、文学、民俗等各个领域。其中非佛教文书近六十件,包括契约、书信、占卜文书等,是研究吐蕃及其毗邻地区历史最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笔者因近年来承担项目之故,对以上写本刊布的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发现编号为 IOL Tib J、Or. 8210、Or. 8211、Or. 8212、Or. 9615、Or. 15000 的非佛教古藏文写本约八百余件(号),加上少数未列入上述编号但存有斯坦因原编号的六十余件,共约 860 个编号。如果加上未来不可预见的发现,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写本的件数,或说编号数应接近九百个。尽管其中有一些编号下可能只有一块残片,或仅存片言只语,但笔者推测,这近九百件中值得深入考释、进而供研究之用的应占一半左右,不可谓不丰富!

二、国外学术界对非佛教文献的研究

1. 托马斯的研究

托马斯的《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一卷主要是从藏文《大藏经》中辑录并翻译了有关于阆的史料,第二卷分七部分刊出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 1. 阿柴(The Va zha, 吐谷浑); 2. 沙州地区(The Sacu Region); 3. 罗布泊地区(The Nob Region); 4. 于阆地区(The Khotan Region); 5. 突厥(The Dru gu); 6. 政府与社会状况(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 7. 吐蕃军队(The Tibetan Army)。以上内容包括转写和译注,将斯坦因所获的社会历史文书中的精华部分公诸于世,共计敦煌、麻札塔格等地出土古藏文写本 120 件,古藏文简牍 380 件。

托马斯在整理、研究敦煌古藏文文书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与法国的藏学家巴考、杜散一起,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进行解读,1946 年出版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巴黎,1940~1946)。其中,托马斯负责解读的是入藏于英国博物馆资料部的,原登录号为 S. 103 (19VIII. 1)、现编为 I. O. 750、B. M. 8212 (187) 的那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公元 743~763 年的这一段。此外,托马斯出版的《南语——汉藏边境地区的一种古语言》^②、《东北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③ 也是他整

① Kazushi Iwao, Sam Van Schaik, 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 8210*, Studies in Old Tibetan Texts from Central, vol. 1, The Toyo Bunko, Tokyo, 2012.

② F. W. Thomas, *Nam,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London, 1948.

③ F. W. Thomas,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1957.

理、研究敦煌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成果，其中刊布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学、占卜和语言资料。

匈牙利著名藏学家乌瑞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评价的“托马斯的著作除了提供一个相当可观的史料集外，同时在吐蕃语言和历史的研究上也是首开其端的巨大成就。虽然他不可能避免开拓者所不可避免的误差，并且不免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甚至还犯有方法学上的错误，但他对卷子的绝大部分的翻译和部分历史、地理的解释仍然站得住脚。因此，他的著作今后在很长时间内也仍将被藏学家当做手册来使用。”^①

2. 武内绍人的研究

武内绍人是日本学术界研究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的著名学者，在他之前虽然有佐藤长、藤支晃、山口瑞凤等著名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但他们的主线并非是在英藏非佛教文献方面，武内绍人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敦煌西域所出的古藏文文献尤其是英藏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刊布及研究。他的《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一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陆续发表研究古藏文契约文书的基础上集成的，共收出自敦煌、新疆而分藏于英、法等国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58 件，汉文契约文书 2 件。该书除了在第一部分用专章对古藏文契约文书作分类和综合论述外，第二部分是对每一件契约文书所作的拉丁字母转写、翻译和注释，可谓是研究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集大成者。

武内绍人另一重要著述，就是他受日本东洋文库资助亲赴英伦，经过多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共 3 卷，图版、音节词索引、写本介绍和转写各一卷。在第三卷中，写本按斯坦因原编号的顺序并配上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的编号列出，每一个编号下介绍写本规格、保存情况、正反面藏文行数、主要术语等，其下分行列出写本的藏文转写体。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可供国际敦煌学、藏学界进一步释读、翻译的宝贵资料！

在此基础上，武内绍人还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举，这里仅仅举出与敦煌、西域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几篇《古藏文 Lho-bal 考》、《北庭、安西（龟兹）和西州的吐蕃与回鹘（790~869. A. D.）》、《一组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书信：古藏文书信类型初探》、《古藏文买卖契约文书研究》、《古藏文借贷契约文书》、《将：吐蕃王朝千户部落的下属行政单位》。^② 近年

① 乌瑞著；荣新江译《有关公元 751 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5，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9~81 页。

② T. Takeuchi, “On the Old Tibetan Word Lho-bal”, *Proceedings of the 3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II*, Tokyo, 1984, pp. 986-987. “The Tibetan and Uighurs in Pei-t’ing, An-hsi (Kucha), and His-chou (790-869 A. D.)”, 《近畿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第 17 卷第 3 号，1986, pp. 51-68.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u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 *Acta Orient. Hung. Tomus XLIV* (1-2), 1990, pp. 175-190. “On the Old Tibetan Sale Contracts.” In S. Ihara and Z. Yamaguchi (eds.)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92, pp. 773-792. “Old Tibetan Loan Contract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51, Tokyo, 1993, 25-83. “TSHAN: Subordinate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ume 2, edited by per KVAERNE, Oslo, 1994, pp. 848-862.

来武内绍人发表的文章有《后吐蕃时代藏语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与影响》^①、《Tshan、srang和tsham: 吐蕃统治于阗的基层组织》^②、《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后王朝时期的古藏文佛教文献》^③、《象雄语最新研究状况》^④、《Alchi 附近地区发现的古藏文碑刻研究》^⑤、《Glegs tsbas: 吐蕃统治时期汉人抄经人的包经纸》等。^⑥

3. 其他学者的研究

在上世纪70~80年代,研究敦煌西域所出的古藏文文献的学者中,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匈牙利藏学家乌瑞(G. Uray)是比较著名的两位。他们的特点是,深入考究了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中能够反映吐蕃统治该区域的政治、军事制度的内容,并与其他文字的相关材料结合,为吐蕃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及其历史影响勾勒出大致的轮廓。当然,这两位学者的上述研究,均是在交叉引用法藏和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以及汉文等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加以精心考证而撰成的。

山口瑞凤的有关著作如下:《讲座敦煌2 敦煌的历史》中的《吐蕃统治时期》一章,《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主编《讲座敦煌6 敦煌胡语文献》等。^⑦此外,他还撰写了《苏毗的领界——rTsang yul Yan Lag gsum pavi ru》、《白兰与Sum pa的rLangs氏》、《东女国与白兰》、《吐蕃的国号与羊同的位置》等文章,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所撰《沙州汉人吐蕃二军团的成立与mkhar tsan军团的位置》、《汉人及通颊人沙州吐蕃军团编成的时间》两文,颇为学术界引用。^⑧大约是同一时期,乌瑞发表的有关吐蕃统治敦煌及敦煌西域吐蕃文书的主要论著如下:《吐谷浑王国编年史:斯坦因敦煌卷子卷69叶84之源流和年代学问题》、《有关公元751年以前的中亚历史的古代藏文史料研究》、《释khrom:公元7~9世纪吐蕃王朝的行政单位》、《9世纪前半叶吐

-
- ①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ed.)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2004, pp. 341-348.
- ② “Tshan srang, and tsham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ibetan-ruled Khotan,”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008/3, pp. 145-148.
- ③ “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Post-Tibetan Imperial Period Mid-9 C. to Late 10 c.,”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ed.) *Old Tibetan Studies 2: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Brill, 2009.
- ④ “Present Stage of Deciphering Old Zhang zhung,”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151 - 165 2009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Yasuhiko Nagano.
- ⑤ “Old Tibetan Rock Inscriptions near Alchi,” *Journ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2012 Vol. 49,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 pp. 29-70.
- ⑥ “Glegs tsbas: Writing Boards of Chinese Scribes in Tibetan-Ruled Dunhuang,” B. Dotson, K. Iwao, T. Takeuchi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an and Dunhuang*, Wiesbaden, 2013, pp. 101-1.
- ⑦ 檀一雄主编《讲座敦煌2 敦煌的历史》,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232页《吐蕃统治时期》;《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讲座敦煌6 敦煌胡语文献》,大东出版社,1985年。
- ⑧ 以上文章分别载于《东洋学报》第50卷4号,1968年,第1~69页;《东洋学报》第52卷第1号,1969年,第1~61页;《东洋学报》第53~54卷,1971年,第1~56页;《东洋学报》58-3/4,第55~95页;《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設研究紀要》4,1981年,第13~47页;《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設研究紀要》5,1982年,第1~21页。

蕃王朝的千户部落》。^①

岩尾一史是近年来崛起的敦煌学、藏学学者，他自 2000 年以来主攻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的研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的军政机构以及其土地、税赋制度等，其著作不可谓不丰富。这里仅例举几篇，难窥全豹 《吐蕃的茹与千户》、《吐蕃万户 (khri sde) 制研究》、《课制 (rkya) 研究序说——吐蕃王朝的社会制度——》、《吐蕃统治下敦煌的施入疏——IOL Tib J 575, 1357 (A)、(B) 考释——》、《吐蕃的会计与支出牒：以 IOL Tib J 897 为例》、《吐蕃王朝的千户及其下属组织——百户，五十户，十户——》、《吐蕃王朝统治敦煌时期的寺领——以 Or. 8210/S. 2228 为中心》、《中亚出土的古藏文田籍》(英文)。^②

岩尾一史还将英藏敦煌汉文文献中夹杂的一件藏文社会经济文书 S. 10647 和 P. T. 1111 相缀合，撰写了《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吏结构研究：以 S. 10647 和 P. T. 1111 为中心》一文。^③ 此外，他与英国图书馆的范谢克合作，借整理斯坦因收集品 Or. 8210 中的古藏文文献之便，新近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文章，如两人合著的《关于〈巴协〉的敦煌残卷》一文，认为 S. 9498 (A) + S. 13683 (C) 的内容与《巴协》中关于寂护赴藏的故事十分相似。^④ 范谢克近年来也撰写了大量的关于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文章，譬如《为圣者与赞普祈祷：早期敦煌佛教祈愿文》等^⑤，不过其重心在藏传佛教方面，所以本文引用不多。^⑥

近年来，德国学者多特森 (B. Dotson) 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于 2007 年发表了《吐蕃王朝的占卜与法律：论骰子在借贷、利率、婚姻和征兵中的法律功能》一文，此文涉及英藏 IOL

① G. Uray, "The Annals of the 'A-ZA Principality——The Problems of Chronology and Genre of the Stein Document, Tun-hung, vol. 69, fol. 84",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Symposium*, Edited by Louis Ligeti, Budapest, 1978, pp. 541-548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y J. HARMATTA (ed.), Budapest, 1979, pp. 275-304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9th Centurie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ed. 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a Kyi, Aris and Phillips LTD. Warminster England, 1979, pp. 310-318 "Notes on the Thousand-distric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Acta Orient. Hung.* Tomus XXXVI. Fasc. 1-3, 1982, pp. 545-548.

② 这些文章分别载于：《东洋史研究》，第 59 卷第 3 号，2000 年，第 1~33 页；《日本西藏学会々报》，第 50 号，2004 年，第 3~15 页 《东方学》第 113 辑 (2007 年 1 月)，第 103~118 页 《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2007 年 3 月)，第 165~189 页；沈卫荣编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3 辑，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3~54 页 《东方学报》88，京都，2013 年，第 350~351 页。《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七号 (2013.03) 第 267~279 页；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 《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75~182 页。

③ K. Iwao, "An Accounting System of Granary in Tibetan-ruled Dunhuang: an Introduction to S. 10647 + Pelliot Tibétain 1111",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2011, XXVI, PP. 39-74.

④ S. Van Schaik, and K. Iwao, "Fragments of the Testament of Ba from Dunhuang",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9, 128. 3, PP. 477-488.

⑤ Sam Van Schaik and Lewis Doney, "The Prayer, the Priest and the Tsenpo: An early Buddhist Narrative from Dunhua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30 • Number 1-2 • 2007 (2009), pp. 175-217; Schaik, S. Van. "Dating Early Tibetan Manuscripts: A Paleographical Method", Dotson, B; Iwao, K, Takeuch, T. (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an and Dunhuang*, Wiesbaden, 2013, p. 103.

⑥ Susan Whitfield (ed.)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 Inc, 2004, pp. 63-71; Sam Van Schaik, "The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65, No. 1 (2002), pp. 129-139.

Tib J 740 号藏文写本对于赋税条例的描述。^① 2009 年,多特森出版《古代西藏纪年》一书,此书是对 P. T. 1288 和 IOL Tib J 750&Or. 8212/187 号《吐蕃大事纪年》的最新研究,附有颇为详尽的注释和图表,值得国内学术界重视。^② 此外,多特森还发表了《关于“尚”:吐蕃王族的标志和进入王家之路》、《吐蕃王朝(7~9 世纪)对外关系中的“甥舅”关系》等文章。^③ 这些成果,国内学者在相关研究时参考、引用颇多。

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就是通过托马斯的著作了解到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的基本内容和学术价值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首次引用了托马斯书中的部分译文。

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王尧、陈践、黄布凡等先后参考国外学者的成果,以敦煌古藏文文献胶片为底本进行考释,撰写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等多部重要的论著或资料,但其中涉及英国收藏的古藏文写本较少,大多与法国的收藏品有关。^④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刘忠、杨铭合作将托马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二卷全书译出,2003 年以《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为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至此,国内学术界方正式完成了对托马斯主要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如: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写本述略》^⑤;黄布凡《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⑥;巴桑旺堆《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⑦;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⑧;马德《Khrom 词义考》^⑨;陈宗祥、王健民《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⑩;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⑪;黄盛璋《敦煌遗书藏文 Ch. 73. IV 〈凉

① “Divination and Law the Tibetan Empire: The Role of Dice in the Legislation of Loans, Interest, Marital Law and troop Conscriptation”, *Contributios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arly Tibet*, Leiden and Boston, 2007.

②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By Brandon Dotson. 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by Guntram Hazod.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vi, pp. 319.

③ “A Note on Shang: Maternal Relatives of the Tibetan Royar Line and Marriage into the Royar Family”, *Journal of Asiatique*, 292. 1-2 (2004): pp. 75-99. “The ‘Nephew – Uncle’ Relation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of the Tibetan Empire (7th – 9th Centuries)”.

④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 年,1992 年增订版;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3 年;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 年;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

⑤ 《甘肃民族研究》1983 年第 1~2 期。

⑥ 《民族语文》1984 年第 5 期。

⑦ 《敦煌学辑刊》1986 年第 1 期。

⑧ 《中亚学刊》(四),中华书局,1990 年。

⑨ 《中国藏学》1992 年第 2 期。

⑩ 《中国藏学》1994 年第 3 期。

⑪ 《敦煌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州节度、仆射致沙洲、瓜州刺史敕牒》及其重要价值^①；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看吐蕃王朝的崩溃》^②；刘忠《敦煌藏文文献》^③；林冠群《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唐代吐蕃史研究》^④；格桑央京《敦煌藏文写卷 Ch. 9. II. 19 号初探》^⑤；杨铭、胡静《新疆安得悦出土古藏文写本研究》^⑥；陆离《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⑦；黄维忠《德噶玉采会盟寺考》^⑧；陈楠、任小波《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概述》^⑨；卓玛才让《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三份相关经济文书之解析》^⑩。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在研究相关论题时，同样不可能仅仅引用英藏而不引用法藏的藏文文献，因此前面所举可能挂一漏万，或者说仅仅从文章标题上看，引用材料偏重于英藏部分。

2002 年，罗秉芬主编《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一部录文、译文和论文的合集，代表了目前敦煌藏医学研究的水平，其中涉及的斯坦因收集品有著名的《藏文医疗术长卷》等，书后所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解题目录》共收英国图书馆藏品目录从 IOL Tib J 401 起至 IOL Tib J 1287 止，中有间断，共计 14 个编号。

2006 年，周季文、谢后芳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一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敦煌汉藏对音语材料作了系统著录，编成汉藏、藏汉两种字音对照长表，成为一部有用的关于敦煌古藏文译音的工具书。其中选用的英藏非佛教文献，重要者有：S. 1000、S. 2736《藏汉对照词汇》、IOL Tib J 756《医疗术长卷》、I. O. 56、57《医疗术》。

2007 年，黄维忠出版《8~9 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一书，该书系其博士论文的最终修订稿，其中共引出敦煌西域藏文发愿文 92 件：法藏 65 件，英藏 22 件，国内藏 4 件，俄藏 1 件。英藏 22 件中，重点考察的为 5 件，它们是 IOL Tib J 452II、IOL Tib J 751I、IOL Tib J 1107、IOL Tib J 1371、IOL Tib J 1772V。^⑪同年，黄维忠还发表了《关于 P. T. 16、IOL Tib J 751I 的初步研究》一文，首次对这件被称为《岱噶玉园寺会盟愿文》的长卷进行了全文汉译，并考证了该卷涉及的诸多人物、事件以及长卷写成的时间问题，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论证了所谓的“岱噶玉园会盟寺”并非著名的榆林窟。^⑫

2011 年，萨仁高娃发表《国外藏敦煌汉文文献中的非汉文文献》一文，系统梳理了法国、英国、俄罗斯藏敦煌汉文文献中的非汉文文献，包含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献，其中英藏藏文部分与前引岩尾一史等人所编《斯坦因收集品 Or. 8210 中的古藏文文献》一书基本吻合。萨仁高娃还总结了汉文文献中的藏文文献的几个特点：1. 汉藏文对照文献较多，

① 《蒙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 年。

②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③ 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④ 项楚等主编《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 年。

⑤ 《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⑥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 年。

⑦ 《西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⑧ 《敦煌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⑨ 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⑩ 《西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⑪ 黄维忠《8~9 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 年。

⑫ 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 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包括佛教术语、地名、物名、东西南北方向名称的汉藏文对照,这是因佛教文献的翻译以及汉藏人民相互交流的需要所产生的文献;2. 藏文字母习字较多,反映了藏文的普及程度及敦煌地区汉人学藏文所留下的痕迹;3. 佛经末藏文抄写者题记具多,经文大多为汉文,抄写者有的是汉人名,有的则是藏人名,可见汉文佛经抄写中既有汉人,也有藏人,而汉人抄写者也用藏文留下题记,反映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藏文的普及程度。^①

除了上述研究进展和成果以外,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本世纪以来学术界还先后开展了若干项有关的研究:

从2007年开始,杨铭与贡保扎西、索南才让两位教授合作,承担了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疆通史》子课题《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文书选译》,从《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中挑选出约三百个号的写本进行编目和翻译。挑选的标准一是写本本身比较完整、内容有价值的社会文书,如借契、买卖契约、书信等;二是包括托马斯转写、译注过的82件写本,这次重新从藏文直接翻译。加上附录部分,该书约40万字,已于201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年,胡静、杨铭合作,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武内绍人全书涉及的古藏文写本进行编目、撰写提要。之前,两人就以《英藏新疆麻札塔格、米兰出土藏文写卷选介》为名,陆续在《敦煌学辑刊》上载出相关文章,到2009年初已经连载5期。此后虽然没有继续连载,但已经编成《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一书,此项目结题后应能公开出版。

从2011年起,杨铭、杨公卫等人合作,在取得了武内绍人的授权以后,着手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一书译成中文,该书的翻译工作也已列入《新疆通史》子课题之列,现已经完成结题,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自2012年起,以黄维忠、陈践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在此前后,由郑炳林、黄维忠主编的《敦煌吐蕃文献选》文化卷、文学卷、社会经济卷先后由民族出版社在2011、2013年出版,收录了法藏和英藏敦煌西域吐蕃文献,据初略的统计,英藏部分占到大约三分之一。^②每一件文献有藏文原文、拉丁字母转写、汉文译文,并附有注释,可以说是研究敦煌西域吐蕃文献的重要读本。据悉该选集还将出版宗教卷、卜辞卷等,这正是学术界十分期盼的。

201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陈践编著的《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 1047 + ITJ 763号〈羊腓骨卜〉研究》一书。敦煌PT 047 + ITJ 763号《羊腓骨卜》是敦煌文献中最长的一件藏文占卜文书,上世纪80年代初,王尧和陈践教授曾合作对其进行过研究,当时的工作主要是转录、翻译和解读,成果先后发表在《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和《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上。此次新的修订主要是发现了法藏PT 1047号文书与英藏ITJ 763号文书可以缀合,并借鉴和参阅了藏族周边民族占卜文献的论著,增

① 萨仁高娃 《国外藏敦煌汉文文献中的非汉文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华夏记忆”专题: http://www.nlc.gov.cn/newhxjy/wjsy/yj/gjgz/csml/201104/t20110428_42177.htm.

② 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学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民族出版社,2014年。

译了卦象，并对译文进行了修订。^①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其中多数藏学家或敦煌学者来说，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但就学术的延续和发展来说，无论是国内或国外，均需要有一批有志者和坚守者来投身相关的领域。

对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姑不便评说，单就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积累和成果而言，目前可以说，对法藏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而对英国收藏的敦煌西域吐蕃文献的研究较为薄弱。法藏方面，有以王尧、陈践、黄布凡、周润年等学者为首进行的全方位研究，其中包括解题目录的编写、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等；近年来又有王启龙等领衔的团队，计划在更新资料的前提下，对法藏敦煌吐蕃文献重新进行解题目录的编写。而英藏方面，目前国内除王尧和陈践编著的《吐蕃简牍综录》、刘忠和杨铭合译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两书，尚能部分反映托马斯的研究成果以外，再无系统反映英国图书馆收藏的这批吐蕃社会历史文献全貌的论著出版。

因而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急需对英国收藏的敦煌西域吐蕃文献进行整理，进行分类研究，而其中比较迫切的又是对英藏敦煌西域吐蕃文献的目录编写和汉文译注。个人以为，借鉴王尧等的成功经验，编写出版英藏敦煌西域吐蕃文献的中文解题目录，这是一个首要的工作。与此同时，应对英藏敦煌西域吐蕃文献进行分类整理与翻译，即分为吐蕃写经文献和社会历史文书两大类，或进行汉译，或英译汉。这样才能与王尧等对法国收藏的吐蕃文献的研究一起，构成系统的唐代吐蕃文献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释读这批吐蕃文献提供阶段性研究的平台，进而为研究唐代吐蕃史、敦煌学、西北民族史提供珍贵的文献资料。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陈践编著《吐蕃卜辞新探——敦煌 PT 1047 + ITJ 763 号〈羊腓骨卜〉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年。